



四川方言语词

和

汉语同族词研究

● 查中林 著

H172.3

323

四川方言语词和 汉语同族词研究

查中林 著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策划组稿:杨宗义

责任编辑:杨宗义

封面设计:杨 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查中林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4

ISBN 7-80659-360-8

I. 四… II. 查… III. ①西南官话-词语-研究
—四川省②汉语-词语-研究 IV. 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7356 号

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

查中林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 5 号(028)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0 千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 册

ISBN 7-80659-360-8/H·25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	(1)
一、汉语同族词研究的简单回顾·····	(1)
二、语源与思维关系的检讨·····	(9)
三、作为符号的语言，其意义需要解说·····	(20)
四、词义引申与同源分化·····	(34)
五、现代方言词语在汉语同族词研究中的作用·····	(60)
释“𦵏”字词族·····	(83)
说“解”字词族·····	(112)
说“辟”字词族·····	(121)
释舌齿音古蒸部字词族·····	(140)
说“凭丰平方”词族·····	(156)
说“义”·····	(193)
说“搞垮”·····	(211)
说“恫拌”·····	(222)
说“坝”·····	(236)

释以“断”为核心意义的同族词·····	(245)
附 录·····	(260)
一种即将消失的文白异读现象·····	(260)
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及器铭的几处误释·····	(264)
周作人《童谣研究》(稿本)断句和文字抄校的失误 ·····	(266)
后记·····	(273)

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

一、汉语同族词研究的简单回顾

一种语言中语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近或相通的一些词(字、语素),聚合在一起,通过分析归纳,如果认定是同出一源,这样的词(字、语素)称为同族词。

同族词与同源词相关而有别。同源词是根据语音对应规律去追溯不同语言中具有相同源头的词,这在印欧系语言中研究得比较深入,而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同族词是一种语言内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意义引申、方言分歧和语音变化而产生的音近义通的词。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很广的语言。它的历史十分悠久,连续性很强,并且现存大量古代书面文献,同族词应该是异常丰富的。汉语的记录工具是既表意且表音的方块汉字,方块汉字从来就没有十分忠实地记录过语言(汉语方言非常复杂,而且歧异性很大),它对于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影响,现在也不能说已经研究得十分清楚了。

词义是概括的,在交际使用时又是相对具体的。因此,词在应用中发展。从临时联想、修辞用法、语法变性,到具有社会约

定性，就形成引申义，而且会不断引申，层层引申，由此形成一个词的词义系统。当词义分枝多，层次多，本义和引申义相距很远的时候，就可能派生新词，并用文字固定下来，由此形成同族词，构成词族。就像家庭，一对夫妻可能生育若干子女，兄弟多了要分家另过，子又有子，子又有孙，由此形成家族。不过人类是每人必有老必有死，而语言中的常用词却可以存活千万年。

汉语同族词的研究，实际是对语源的追溯，也是对语词意义的溯源察流。它既可以由今溯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今古。例如，以近现代为今，则19世纪中叶以前为古；以明清白话为今，则唐宋白话为古；以唐宋为今，则秦汉为古；以秦汉为今，则先秦传世文献为古；以先秦传世文献为今，则商周甲金文为古），以现代单音词或语素的音义构成去追本溯源，考求方言本字即是其中一种方式；又可以探古察今，以古代的根词或核心词（表意字或形声字声旁）为基础，去描述词族的孳生繁衍分化的过程。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汉语词源研究的历史作一番回顾和总结。全面总结非我所能，只能作一个简单回顾。

语源的研究，最初导源于声训。声训是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来训释词义。这原是训诂学史上自发的、原始的训诂方法。我国的训诂学萌芽于先秦时代。在先秦经传文本对语词的训释中，声训就出现了。著名的如：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

《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尽心下》：“征之为言正也。”又：“仁也者，人也。”

《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

《荀子·王制》：“君者，善群者也。”

《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又《乐记》：“德者，得也。”

《易·离·彖》：“离，丽也。”又《晋·彖》：“晋，进也。”又《说卦》：“乾，健也。”又：“履者，礼也。”

由于秦的焚书及秦汉之际的兵燹，先秦典籍丧失殆尽。汉初君臣，大多来自南方下层，与当时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显然隔膜。废挟书令之后，人们才开始从遗老口中，从民间收藏，乃至从藏于墙壁内的残篇中去搜集整理古籍。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由于存在文化的某种断层，存在古今与各地之习俗与方言的差异，在文化继承，古籍整理，乃至文化交流与建设的过程中，语言问题应相当突出。为解决这个问题，汉代训诂学蓬勃发展，声训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白虎通义》在这个方面都走得较远。他们的本来意愿，是以追索语源的方式，来证明与封建等级制度有关的政治、伦理、名物的天然合理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谄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谄而效也。……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这里面蕴含的声与义之间的理据说姑且不论，他看到语音相近的词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关系，还是触及了一定的事实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君王士民作了解释：“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士者事也，民者暝也。”这些被某些哲学史家斥为“一派胡言”的解释，恐怕是当时的官僚学者们的一种共识，一种对

君王的期待，一种应然的判断：王是伟大的，王是方正不偏私的，王是匡正错误的，王是居于中央的，王是能使天下臣民归往的；君是邦国之元首，君是政策之本原，君是政策是非及臣民行为的仲裁者权衡者，君是温煦因而使人亲近的，君是能使臣民群聚的。《白虎通义》中的这种声训更是触目皆是。例如《五行》：“水之为言准也。”“木之为言触也。”“火之为言化也。”“金之为言禁也。”“土之为言吐也。”又《嫁娶》：“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夫者扶也，妇者服也。”又《日月》：“日之为言实也，月之为言阙也。……星者精也。”

《说文解字》的声训也颇不少。例如：天，颠也。礼，履也。古，极也。尾，微也。田，陈也。门，闻也。户，护也。火，燬也。衣，依也。山，宣也。木，冒也。东，动也。羊，祥也。马，武也，怒也。棺，关也。母，牧也。室，实也。走，趋也。趋，走也。造，就也。如果算上声训之字夹杂在句子之中，而实际仍可看作声训的，数量就更多了。例如：名，自命也。土，地之吐生物也。房，室在旁也。王，天下所归往也。史，记事者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川，贯穿通流也。班，分瑞玉也。禴，会福祭也。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清邓廷桢曾作《说文双声叠韵》，对此加以收录，可见其应用声训多而且广。毛氏传《诗经》，郑玄注三《礼》，都用过声训的方法。

到了汉末刘熙的《释名》，则是全面地自觉地用声训方法训释词义以求语源。其自序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他的声训，有一些是符合语言真实的。例如：“盲，茫也。茫茫无所见也。”

(《释疾病》)“威,畏也,可畏慎也。”(《释言语》)“山夹水曰涧。涧,间也,言在两山之间。”(《释水》)“帐,张也,张施于床也。”“负,背也,置项背也。”(《释床帐》)“肿,鍾也,寒热气所鍾聚也。”(《释疾病》)有极少数散见于各部分的解释,汇集拢来就是一个小小的词族。例如:“颈,径也,径挺而长也。”(《释形体》)“胫,茎也,直而长似物茎也。”(同上)“泾,径也,言如道径也,水直波曰泾。”(《释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可通也。”(《释典艺》)“径,经也,人所经由也。”(《释道》)颈、胫、茎、泾、经、径等字皆从丕声而以形旁别其词性和义用,音同义近,都有“长细直”的涵义,就是同族词。

《释名》声训的基本方法是从一些音同音近的字当中挑选出一个意义相关的词去解说被释词,因此无法区分是偶然同音呢还是真有同源关系,主观随意穿凿附会的比例较大,而真实可信的比例较低。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从先秦到两汉,声训已成为语言历史上探索语源的一种重要方法,虽未完善,但它触及到了词的意义内容与语音形式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其音义必须相近的原则也已确立。这种“因声求义”的方法,对当时学者来说,是无须论证的事实,势所必然的方法,因为当时的语言就一直在“因音生义”。这些都为后人的继承和发展启示了门径。

汉代在声训的方法之外,又有“语转”之说。“语转”包括古今音转和方言音转。古今音转是词的历时性变化。方言音转则是词的共时的地域性的变化。根据现代方言学的研究,某些方言的地域性的区别,可能反映了语言的历时性区别。汉代扬雄《方言》就提出了“转语”一词,指因时地不同而音有转变的词语。

例如,《方言》卷三:“庸谓之𡗗,转语也。”又卷十:“燂,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焜,火也。”郭璞注《方言》,也出现了声转、声之转、语转等术语。例如,《方言》卷一:“……京、𡗗、将,大也。……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𡗗,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郭注:“语声转耳。”按,今普通话说人曰“壮实”“健壮”,说庄稼曰“茁壮”。四川话亦如此说,但口语中凡言人与物之粗大粗壮健硕曰“𡗗”(上声)。又用作动词,凡添加零头使成整数曰“𡗗”。如:~起/~够/~秤/再~点,再~点儿。又卷五:“薄,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𡗗,或谓之𡗗。”郭注:“此直语楚声转也。”又卷十一:“蝇,东齐谓之羊。”郭注:“此亦语转耳。”郑玄注经,亦有“声转”的术语。例如,《诗·周颂·有瞽》:“应田县鼓。”郑玄笺:“田当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应鞀之属也。声转字误变而作田。”语转之说,是从语词的声音联系来追寻语词的语源联系,也是一种语源研究。

“右文说”的萌芽产生于晋。《艺文类聚》引杨泉《物理论》:“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这表明,杨泉已经感觉到汉字形声字某些声符相同的字意义可能相通。径以“右文”来指称声符,并据以系联同源词,始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之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戈,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戈为义也。”宋人王观国(《学林》五)、张世南(《游宦纪闻》九)、戴侗(《六书故》)皆曾道及,不仅根据声符考察了一些同族词,而且对声符载义的原理的认识也有所前进。右文说使语源研究从

单词溯源转入了系列探索。

到了清代，语言文字之学大为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朱骏声等，都为汉语同源词的研究作出了远迈前人的贡献。

清代的学者既是训诂大师，又是古音学家。他们有简朴的语言学理论，有坚实的古音研究成果，有不懈地训释古典文献的实践及深厚功力，有全面整理和注释古籍的实绩。他们对记录汉语的汉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其基本理论，来自对汉唐语言学家的观点的继承。在语词音义的关系方面，音是根本是关键的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汉代郑玄说过：“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据秘逸。”（见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唐代孔颖达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见《尚书·序》正义）唐代顾齐之《慧琳一切经音义序》：“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明末方以智《通雅》：“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些说法虽不系统精密，但却一脉相承，逐渐明确。清代学者们近似的说法是大量的，明确的。戴震《六书音韵表序》：“故训音声相为表里。”《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在《说文解字注》的注释文字中，散见于各字头下的“以声为义”的议论相当多。例如，“禛”字注：“声与义同原，故谐声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晤”字注：“同声之义必相近。”王念孙《广雅疏证序》：“诂训之旨本于音声。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

“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这些学术观点，指导了他们的训诂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朱骏声以声符为纲重新编排《说文》的方法，会使阅读者产生强烈的音近义通的感受。

到了民国时代，章太炎、杨树达、沈兼士等人把汉语语源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对传统学术有很深的功底和极好的领悟，又都在国外居留过，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他们都是既有同族词系联的实践操作，又有理论的探索。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产生和发展及其推阐》、杨树达《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文字孳乳之一斑》等文，推寻语词在形音义诸方面的演变轨迹，揭示了汉语语言文字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有《新方言》，杨树达有《长沙方言考》及《续考》之作。他们研究方言语词的实际经验，对于深入探索语言词汇的发展和意义的引申分化，必然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源研究成为汉语史研究中的热门。王力、刘又辛等老一辈学者在理论探索与词族系联的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任继昉的《汉语语源学》（重庆出版社），殷寄明的《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的理论探索，张希峰的《汉语词族丛考》及《续考》（巴蜀书社）的同族词系联，也都是好学深思之作。一些文字学著作也涉及了语源问题。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詹鄞鑫的《汉字说略》，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语源问题。训诂学著作的“因声求义”的章节，也是讲这个问题的。这表明，汉语语源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认为，研究汉语同族词，应该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从词义引申文字分化语音演变的历时角度，来分析汉语汉字系统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历时的研究中，要充分利用现代方言口语

材料。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语源与思维关系的检讨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产物。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交流思想的产物。它与人类文化人类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的“每一语言都已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它把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密切联系表述得十分清楚。我们学会一种语言，实质上就是学会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认识世界的方法。

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一个词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约定的，还是有道理可说的？学者们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家较能接受的是沈兼士先生的说法：“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声训论》）因为古汉语词语和现代口语当中音近义通的现象太普遍了，令人无法否认。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伽达默尔说：“语言先于思想。”语源的研究，可以为研究人类思维的发展演变提供必要的证据；而人类思维发展演变的研究，则是研究语源的必要条件之一。

大体而言，人类思维总是发展的，从模糊到清晰，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清晰到模糊，从抽象到具体，循环往复，辨证发展，螺旋式上升。而人类语言结构也相应地从简单到复杂，语词数量由少到多地发展着。

马克思很赞赏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形象思维的进行程序作了两条概括：一是以己度物的隐喻，二是想象性的类概念。他认为，原始民族都用形象鲜明突出的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来代表同类的事物。这种从个别来认识一般的方法，所依据的是关于人类的心理活动的一条原则：“每逢人们对远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观念时，他们就根据近的可见的事物去对它们进行判断。”“原始人仿佛是些人类的儿童，由于还不会形成关于事物的通过理解的类概念，就有一种自然的需要，这就是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或普通性相（一般），把它作为一种范型或理想的肖像，以后遇到和它相类似的一切个别事物，就把它们统摄到它（想象性的类概念）里面去。”（维柯《要素》，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97年版上卷，342—343页）

伍铁平曾说：“古老性和语言的模糊性是成正比的。”（《语言的模糊性和词源学》，《外语教学》1986年1月）在为本来是“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的林林总总的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原始人往往求同存异，抓住事物的共同的或相似的或相通的性状特征，分类来为事物命名。可以设想，初时语言的音节会相当少，发音也必然含糊。正因为音节含混模糊，所以发展变异的可能性就相当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音节会增加，也会逐渐清晰明确。与此相应，音节所表示的语词及其意义也会逐渐明确清晰且数量增加。这些增加的语词，大多不是无中生有突然产生，而是原有的词语分化孳生的。这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界或人类生活中原有的事物，在语言中本是模糊反映的，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明确与深化，其所代表的事物会有所区别，语言也可能相应地分化。另一种是新发现的事物或人新创造

的事物，人们在为之命名时，同样是抓特征，求相似，引申触类，从已知推未知，以此事物之名命彼事物之名。这种由此及彼，从已知推未知的认识规律，不仅体现在人类认识的初始阶段为具体事物命名，在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为抽象事物命名时也有所体现。但是，客观事物本身具有多种属性，在运动发展变化时也会呈现多种状态，人们对事物及其变化的认识也不一定采取一个固定的角度，这就使意义的呈现和人们对意义的解释，都会有某种不确定性，乃至变异性。

例如，瓜是圆的，果是圆的，瓜果的花在未开放时（蓓蕾骨朵）也是圆的。民以食为天，跟食物有关的植物花果应该是人类最早认识并为其命名的事物之一，大约是读 [koa]。稍后人们会认识到瓜果花的区别。再进一步，瓠（葫芦）是圆的，芋头是圆的，人造的壶是圆的，人造的鼓是圆的，人造的车车身不一定圆，但其主要部分（轮毂轴）均是圆的。瓜 [koa]，果 [kua]，花 [xoɑ]，瓠壶 [va]，芋 [viwa]，鼓 [ka]，车 [kia]（用郭锡良所拟古音），读音何其相近！而且，根据现在同源词研究的结论性意见，古代的联绵词往往有相对应的音近义近的单音节形式。例如：葫芦、壶卢、浑沦、昆仑、括楼、栲栳、骷髅、佝偻、窟窿、穹隆、廓落、喉咙、果臝、骨碌、囫囵、块垒、圪垯、傀儡、克郎、甘蓝等，它们的声母都是 g—l—或 h—l—，存在音转关系，在意义上都含有浑圆之义。如果再加上音转为其他形式而意义相近的联绵词，这个词族就庞大了。

人的意识，大体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具体又再抽象的辩证发展过程。大约人类认识的初始阶段，总是先认识各形各色的具体实物，积之久则会发现各色各形的具体之物有着某种共同的

特征。例如，瓜果都能吃，所以特别注意，瓜果都是圆整的，于是抽象出圆转的观念，并用与瓜果相近的音去为一些新发现的或人造的圆整之物命名。例如：花、瓠、芋、鱼、车、鼓、壶、锅、弧，这些都是名词。如果加上声音能通转的一些动词形容词及其所分化的词，例如圆、滚、回、环、卷、军等，那就不知凡几了。其实这些东西的所谓圆转，只是一种大略的近似的“圆”，分析之，有球体之圆，有柱锥之圆；有平面之圆，如浑圆椭圆；有线条之圆，如弧圈之圆。有静态之圆形，有动态之圆转。此外，大体完整的块状物也可称圆。

这就必然导致人们认识的深化，导致语词意义的引申、分化、复杂化和系统化。那么，人们为什么对圆转如此着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史密斯认为：圆圈以及具象——轮子是最富于哲学意味的原型象征，由于圆圈中的开端和结尾是同一的，形式简单而且完整，因此被认为是最完美的形象；轮子有辐条而且还会转动，轮子的辐条被认为是太阳光线的象征，生命之源来自中心，因此被看作是创造力的象征。又因为轮子旋转时其轴心是固定的，转圈运动是完全规则的，因此人们把这种特征象征为真理，即是寻找人的经验和活动的稳定秩序。人类最初的语言就是由这些具有鲜明形象的原型性象征组成的，人类的思维和自我就是依赖于丰富多彩的隐喻和象征开始发展的。这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思维心理过程。（转引自任继昉著《汉语语源学》62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谈艺录》中，评述了古今中外的人们对圆的正反褒贬的认识，可谓打通而辨析之，实在令人心折。钱先生的成就，昭示了词汇研究要注意分析其异，更应注意圆通求同。